



清华大学文科出版基金
QINGHUADAXUEWENKECHUBANJIN

人文日新学术文丛

How To Understand Being?

——“是”到底论

王路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人文日新学术文丛



How To Understand Being?

——“是”到底论

王路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对being这个概念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说明,尤其是结合逻辑与哲学的关系说明,为什么应该在“是”的意义上翻译和理解,为什么应该把这样的翻译和理解贯彻始终。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圣经》中的相关部分为基础,本书详细讨论了为什么应该在“是”的意义上理解相关的being,并讨论了学界的相关译文,回应国内一些著名学者的批评意见,从而更好地阐述和论证——“是”到底论的观点及其意义:为什么这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从——“是”到底论这样的理解出发,对西方哲学可以获得什么样的理解。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是”到底论/王路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人文日新学术文丛)

ISBN 978-7-302-47098-4

I. ①—— II. ①王… III. ①哲学—研究 IV. ①B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6263号

责任编辑:李 莹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沈 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0mm×230mm

印 张:25

字 数:297千字

版 次: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78.00元

产品编号:069323-01

序

近年来在与 being 相关的讨论中，我被称为“一‘是’到底论”的代表，人们对我提出了许多问题和看法。本书回答了许多见诸文字的质疑和批评，使关于 being 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得到深化。这里，我想就几个私下交流中遇到的问题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在我看来，它们与 being 相关，也很有趣。

being 应该译为“是”，而不是译为“存在”，这一观点似乎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常有人对我说，总体上可以理解这种看法，也认为它有道理，但是总觉得它还欠缺些东西。对熟悉的人我常笑着回答：“就是欠缺些与你知识结构中有关‘存在’的认识对应的东西。张无忌在给周芷若输入九阳真气疗伤的时候，不是总觉得她体内有一股怪异的内气在与自己的真气抗衡吗？！”这话是说着玩的，不必当真，但是却隐含着我对国内学界的一个认识。

中国人学习哲学,总是从阅读中译著作开始的。由于 being 译为“存在”乃是普遍现象,因此当一个人真正步入研究阶段的时候,他或她已经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积累了许多有关存在的理解和认识,“存在”一词甚至已经成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用语。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不断学习和研究的深入,能够认识到“是”这个译名有道理而“存在”这个译语有问题,这本身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接受一“是”到底论又谈何容易?!因为“是”与“存在”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且不说抛弃甚至铲除多年形成的知识积累在情感上有多么难以接受,需要做出多么巨大而持久的努力,至少在这一过程中,已有的知识结构一定会时时处处以不同方式顽强的抵抗。不仅如此,现有的中译著作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培养和造就未来的哲学研究者,而在他们身上,上述感触和困惑以后依然会同样出现。所以,“欠缺”感是正常的,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体现。有这种欠缺感没有关系,问题在于如何对待它。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积累,这是长期学习所形成的,也是宝贵的。但是一个人应该努力使它成为促进自己学习进步的要素,而不要让它阻碍自己的发展。

有许多人对我说,那些中译著作大多出自名家啊!他们也都留过学呀,有人还有学位。怎么可能他们关于 being 的翻译和理解都错了呢?!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也许很自然,却是典型的诉诸权威或诉诸大众。由于涉及译者,通常我不发表意见。应该看到,西方学术进入我国的历史并不长,西方哲学引进的时间则更短。因此就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而言,国内的基础其实非常薄弱。更何况西方哲学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的学科,涉及多种语言文字的使用,集西方科学、思想、政治、宗教、语言等交织的大成,经历了从一体到众多科学的分离,因此西方哲学是一个独具

特色的学科。西方哲学自身又有形而上学与其他哲学之分。形而上学被公认为是难懂的，形而上学著作也被认为是最难懂的，而 being 问题恰恰属于形而上学。想一想，在不长的历史积累上学习形而上学，在完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理解 being，难道真的会没有问题吗？同样是学习和研究哲学，或者自认为或自诩是学习和研究最正宗的哲学，难道理解并把握的真的就是形而上学吗？

而就译者个体而言，在早期没有中译本的时候，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一定积累了许多中国思想文化的东西。那里可以有“存在”，可以有“有”“无”，但是不会有“是”。而中译本出现之后，如上所说，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一定会积累许多有关存在的认识。这些术语及其形成的概念和认识都会影响甚至支配他们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他们相互“参照”，不断重复和加深这样的概念和认识。此外，一些人学习西方哲学是从翻译外文著作入手的，还把这看作进入西方哲学的途径，有些翻译甚至是为了读懂它。这样，许多译著并不是研究的结果，而是学习的产物。译者最后以译著而名家，因为名著传播了译者的名字，但翻译中的问题也随着译著深入人心。一个人第一次把自己的翻译变成印刷符号的时候，他或她可能还会有些沾沾自喜。但是对翻译中的错误，他或她并没有清楚的认识，甚至没有意识。翻译还会继续，由于各种原因，也许第一次翻译错了，以后永远都是错的。我是研究者，也做过翻译。我懂得翻译的艰辛，也尊重译者的工作，但是我知道，诉诸权威或大众绝不能成为考虑 being 的依据。

有人曾对我说，你的观点是颠覆性的，大概不会被人接受，尤其是不会被译著等身的人接受。这话说得直白，有些一针见血。being 是西方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它的翻译若是错了，改正起来确实代价很大，一

如梁存秀先生所说，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我的工作除了使人认识到应该如何理解 being 之外，似乎还会使人隐隐感到：已有的理解要重新理解，已有的翻译要重新翻译。假如这确实会得罪一些人，那么借用达米特的话说：“我不道歉。”在这一点上，我敬佩王太庆先生和汪子嵩先生，他们晚年的工作表明，他们实实在在地在重新翻译和重新理解西方哲学。

近年来在开会和讲学时常有人问我，还在研究 being 问题吗（哪）？（！）有人表现出关心、关注，也有人透着调侃。有人对我研究 being 多少有些不理解。在他们看来，你研究逻辑，也研究分析哲学，而 being 的研究属于形而上学，后者似乎与逻辑没有什么关系，至少与分析哲学没有什么关系。对此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1992 年，我在相关研究中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叫《“是”的逻辑研究中》。我常说，being 乃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核心概念，也是他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二者字面上就是相通的。因而在有关 being 的研究中，逻辑与哲学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看不到这一点，形而上学研究是不得要领的。2003 年我出版了《“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一书，明确使“是”与“真”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清晰的思路。在传统哲学中，“是”与“真”体现了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二者又可以是对应的，因而人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去探讨形而上学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理解形而上学。这个思路提供了一条理解形而上学的新的有益途径。新，指的是它与以往“存在”和“真理”的理解不同，后者不仅有问题，而且相互无法产生联系，至少字面上看不出有什么联系。有益，指的是它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西方哲学。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哲学中有关 being 的讨论，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分析哲学中有关 truth 的讨论，比如，为什么传统哲学中 being 是核心概念，而在

分析哲学中 truth 是核心概念？不仅如此，这一思路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哲学史一种从 being 到 truth 的发展和转变。因此，有关 being 的研究不是单纯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正是从 being 与 truth 的联系之中，可以看到西方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和主线，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

有人对我一直研究 being 问题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being 有系词含义和存在含义如今已然众所周知，将它译为“是”还是“存在”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此没有必要再讨论了，或者，哪里还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讨论呢？我对这种不以为然的態度也是不以为然的。在《“是”与“真”》一书中，我明确阐明，在西方哲学讨论中，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 being，应该把它译为“是”而不是译为“存在”，并且应该把这样的理解和翻译贯彻始终。不仅如此，我还强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难懂，国内学界许多人也认为分析哲学难懂。在我看来，它们之所以难懂，在很大程度上与“是”与“真”相关，与对它们的理解相关，与讨论它们的方式相关。所以，我不断重申上述看法：这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既然这是形而上学主线上的问题，是核心问题，既然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当然应该持之以恒，而不是浅尝辄止。在我看来，这些年来国内学界关于 being 的问题有了一些讨论和认识，取得一些进步，但是远远不够，还有大量工作需要我们去。我认为这一工作是值得的，因为“是”的问题归根结底乃是与“真”相联系的，“是”与“真”的问题乃是十分有价值的哲学问题，对它们的理解也是一个检验我们理解西方哲学的尺度，因为正像我以前的书名所说，它们是形而上学的基石。

最后说一下，一“是”到底论不是我提出来的，是人们对我的观点的称谓。以前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只是借用它。记得有一次在讨论中，我强调自己的观点乃是“对‘是’的理解贯彻始终”，王晓朝兄直言：“你就是一‘是’到底论！”好的，就一是到底论吧。

感谢清华大学文科出版基金的支持！

感谢《清华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求是学刊》《哲学分析》《世界哲学》《经济·科学·社会》《云南大学学报》《哲学门》等刊物！它们发表了本书的部分内容。

衷心感谢北京书生研究中心！多年来它一直资助我的学术研究，没有任何要求，不求任何回报。

衷心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所有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劳的同志！

作者

2016年1月清华荷清苑

目 录

序	i
第1章 导论：“一‘是’到底”成大道	001
第2章 文本解读	012
2.1 亚里士多德的 to on	013
2.1.1 翻译与理解	013
2.1.2 系词和存在含义	024
2.1.3 依自身的“是”	034
2.1.4 “是”的两种不同说明	045
2.2 康德的 Sein	053
2.2.1 对康德论题的翻译和看法	053
2.2.2 从下文的理解	058
2.2.3 从上文的理解	064
2.2.4 康德的论题	068
2.2.5 康德的问题	079
2.3 黑格尔的 es ist	083
2.3.1 读不懂的“存在”	085
2.3.2 读不懂的举例说明	090

2.3.3	“它是”	098
2.3.4	含索引词的例子	104
2.3.5	“它是”的意义	109
2.4	《圣经》中的 I am	115
2.4.1	上帝的名字	115
2.4.2	上帝名字的翻译	120
2.4.3	对上帝的理解	123
第3章	“是”还是“存在”？	130
3.1	熊伟先生的“在”	131
3.1.1	“在”与“存在”的明显区别	132
3.1.2	为什么是“在”而不是“存在”？	140
3.1.3	“在”给我们的启示	144
3.1.4	应该是“是”而不是“在”	150
3.2	王晓朝教授的“语言困境”	162
3.2.1	几个明显的问题	163
3.2.2	关于“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理解和翻译	166
3.2.3	语词与语词所表达的东西	173
3.3	孙周兴教授的翻译要求	179
3.3.1	两条翻译要求	180
3.3.2	关于语法	184
3.3.3	关于母语语感	189
3.3.4	being 的翻译原则	193
3.4	倪梁康的“回应”	198

3.4.1	讨论的方式	199
3.4.2	讨论中的问题	202
3.4.3	讨论的结论	208
3.4.4	逻辑与哲学	216
3.5	“eimi” 与 “是”	221
3.5.1	eimi 的词汇意义	223
3.5.2	语法与词义	229
3.5.3	einai 和 on 的语法	237
3.5.4	on 的词义	243
3.5.5	eimi 的动词含义与一 “是” 到底论	248
第 4 章	理论探讨	260
4.1	Being 与举例	263
4.1.1	例子及其翻译	264
4.1.2	例子及其理解	267
4.1.3	“上帝是” 与 “上帝存在”	271
4.1.4	几个问题	275
4.1.5	为什么要 “一 ‘是’ 到底” ?	279
4.2	Being 的翻译	285
4.2.1	翻译的同异	285
4.2.2	组合词的翻译	287
4.2.3	名词的翻译	291
4.2.4	“存在” 与存在含义	294
4.2.5	being 与句式	298
4.2.6	being 的翻译原则	302

4.3 语境论与“一‘是’到底论”	315
4.3.1 语境论的批评及其弱点	316
4.3.2 being 的多义性	319
4.3.3 系词含义与存在含义	322
4.3.4 存在含义的语境	326
4.3.5 语境的理解与翻译	330
4.3.6 “一‘是’到底论”的实质	335
第5章 如何理解西方哲学	341
5.1 “是”与认识方式	342
5.2 “是”的多义性	348
5.3 “是”与“真”	359
5.4 形而上学的实质	369
主要参考文献	376
索引	383

第1章 导论：“一‘是’到底”成大道

国内学界关于 being 的讨论有很长的历史，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它在过去二十年间形成热点。回顾有关 being 的讨论，大概可以看出，人们有一个共识，即都认为 being 一词有多种含义，其中最主要的是系词含义和存在含义。但是人们也有分歧，这主要表现在对它的翻译上。以下三种观点大概最具代表性：

其一，being 应该译为“存在”，而不应该译为“是”。这一观点可以简称为“存在论”。

其二，being 应该译为“是”，而不应该译为“存在”。这一观点可以简称为“是论”。

其三，being 应该在不同语境下选择不同的译名，即有时候译为“是”，有时候译为“存在”。这一观点可以简称为“语境论”。

在以上三种观点中，表面上看语境论是比较有道理的：既然承认 being 是多义的，当然应该根据它在不同上下文的不同含义来选择不同

的译名。相比之下，其他两种观点明显有局限性：无论“是”还是“存在”，似乎都无法反映出 being 一词的多义性。

我一直主张，应该以“是”来翻译和理解 being，并且把这种翻译和理解贯彻始终。人们称我的看法为“一‘是’到底论”，认为它比第二种观点还要极端。在相关讨论中，为了方便，我也常常借“一是到底论”之名来表达自己的观点¹。但是必须指出，我在讨论中始终强调一点：把 being 译为“是”还是译为“存在”，这并不是单纯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具体一些说，我所强调的并不是应该把亚里士多德说的“研究 to on hei on”译为“研究是本身”，或者将笛卡儿说的“我思故 sum”译为“我思故我是”，因而我所强调的并不是“是本身”或者“我是”这样的译文容易理解还是“存在”或“我在”这样的译文容易理解，也不是它们谁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我所强调的是，应该理解亚里士多德用 to on hei on 或者笛卡儿用 sum 表达了什么，因而究竟是“是本身”或“我是”这样的译文更好地表达了他们所要表达的东西，还是“存在”或“我存在”这样的译文更好地表达了他们所要表达的东西。在本书中，我仍然借用“一‘是’到底论”称谓自己的观点。围绕这一观点我要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就应该把 being 译为“是”；另一个是，为什么即使从翻译的角度来看，也应该把 being 译为“是”。前一个问题直观上即可以说清楚；后一个问题则要基于前一个问题的说明。因此这里我们只对前一个问题做一个大致的说明，待全书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之后，我们再对后一个问题做出明确说明。

1 在表达上，我不介意“一‘是’到底论”与“一是到底论”，以及“一‘是’到底”与“一是到底”等不同表达之间的区别。我将它们看作同义的，区别只是修辞上的。

在我看来，可以从三个方面简单地说明，为什么从理解西方哲学的角度出发应该把 being 译为“是”。

第一个方面是考虑举例说明。西方哲学家在讨论 being 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举例说明：“风是冷的”（柏拉图），“人是理性动物”（亚里士多德），“金子是黄色的”（胡塞尔），“天是蓝的”“狗是在花园里”（海德格尔），等等。这些例子简单明了，不会有任何理解的问题。举例要与哲学家们说明的东西结合起来理解。如果把 being 翻译为“是”，就很容易理解，他们所要说明的乃是“是”，所举的例子都含有“是”，因而举例与所要说明的东西相一致。由于例子是自明的，因而有助于说明所要探讨的东西。但是，如果把 being 翻译为“存在”（或“在”），问题就来了：所举的例子与所讨论的“存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些例子中有“是”，而没有“存在”。

有人把 being 翻译为“在”，把例子中的“是”改译为“在”，比如“狗在花园里”。这样，上述问题似乎就没有了：所要说明的是“在”，例子中也有“在”，二者正好匹配。其实不是这样。“狗在花园里”中的“在”乃是介词，而不是系词。我想问：海德格尔所要说明的 being，难道会是介词意义上或以介词所表达的东西吗？还有，“在”的翻译能够贯彻始终吗？比如前四个例子如何翻译呢？难道可以翻译为“风在冷”“天在蓝”吗？它们与“风是冷的”“天是蓝的”意思还是一样的吗？即便可以认为它们意思差不多，对“人是理性动物”这句话又该如何改译呢？难道可以有“人在理想动物”这样的翻译吗？而且，这还仅仅是字面上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同样一个 being，在一些例子中被翻译为“在”，在另一些例子中被翻译为“是”，难道这会是举例者谈论 being 的本意吗？

当 being 与其他概念组合使用的时候，这样的问题还会变换形式出

现。比如，我们会看到“战士应当勇敢”这样的中译文例句。单看例子，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结合它所要说明的东西，比如“应当在”，问题就来了：例子中明明没有“在”！一个与“在”没有任何关系的例子又如何能够说明“应当在”呢？其实问题远不止这些。若是把 being 翻译为“存在”，原本讨论的问题乃是“存在”，但是到了与“应当”相关的时候，“存在”就变成了“在”。且不论“在”与“存在”是不是相同的概念，意思是不是相同，至少字面上是不同的。而到了举例说明中，不仅看不到“存在”，甚至连“在”也无影无踪。请想一想，这样的翻译难道不是有些太随意了吗？而这样的译文难道是可以理解的吗？

在我看来，把 being 理解、翻译为“存在”，然后由此出发，把 being 翻译为“存在”“在”和“是”，结果使同一个词变成不同的词，同一个概念变成不同的概念，或者使它在本该出现的地方甚至消失不见，乃是非常错误的。举例无疑是为了说明想要说明的问题。但是，难道西方哲学家们不明白这一点吗？难道他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吗？

就中文而言，“存在”的意思是明确的，它不像“在”那样有歧义。翻译时遇到例子，“存在”一词通常是无法使用的。且不要说它对“人是理性动物”“天是蓝的”“风是冷的”这样的例子束手无策，即便对“狗是在花园里”这样的句子，它大概也是无能为力的。难道可以有“狗存在在花园里”（或“狗在花园里存在”）这样的翻译吗？它的意思与“狗是在花园里”的意思是一样的吗？

“存在”的意思是明确的，而且它的使用范围很窄。在日常表达中，大概除了说“某物存在”或“存在某物”外，几乎没有其他用法。它的狭窄用法和明确含义决定了它根本无法反映出 being 的含义。所以，人们把例子中的“being”理解翻译为“是”，或者说在例子的翻译中